



抗戰小叢書

# 抗戰與新聞事業

王新命著

中國文化建設協會主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王新命著

抗戰  
小叢書

抗戰與新聞事業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四版

版權所  
翻印必究

抗戰小叢書  
抗戰與新聞事業一冊

(05679)

每冊實價國幣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王新命  
編者 中國文化建設協會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長沙南正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漢口重慶南昌安慶  
成都西安開封金華

分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分館  
廣州梧州昆明福州  
香港汕頭貴陽廈門

(本書校對者沈鴻俊)

## 本叢書發刊旨趣

中華民國對敵人已展開血的搏鬥，中華民族已進入了空前的大時代，我們應當怎樣去加緊磨鍊，加緊努力，以期對國家民族的大時代有所貢獻？

現代戰爭是全民族的戰爭，也就是整個國力的對比，所以戰事一經發動，每一個國民應該都是國家的戰鬥員，不論是武裝的或非武裝的，每一種貨物都是國防的必需品，無論是否直接屬於軍需，而最後勝利與失敗的判定，即繫於全國人與物總和後實力的強弱。我國近百年來，內有封建殘餘的壓迫，外有帝國主義的欺凌，國防實力，喪失殆盡；惟四萬萬五千萬的龐大民衆，任何強暴猶不能輕視。現在前方浴血抗戰的忠勇將士，已使敵人遭逢意外的挫折，祇要吾後方四萬萬五千萬民衆，人人抱着共赴國難的決心，則最後勝利，必屬於我。

不過民衆的力量，有如地下的寶藏，不去開發，必無所得；故努力於民衆潛在力的發揚亦是當前重要的抗戰工作。

發揚民衆的潛在力，最迫切而需要的，就是灌輸抗戰的知識和技能，藉以引起抗戰情緒，充實抗戰實力。現在的出版界，對於抗戰各方面人人應讀的系統整套書籍，畢竟還覺得太少，本叢書的出版，就是要補救這個缺點。我們希望全國民衆人人都有應付進入大時代的必要常識，故在各種學科各種問題中，提鍊出新的滋養，貢獻些新的啓示。下列二個目標，便是中國文化建設協會編纂本叢書的要旨：

甲、本叢書以民衆在抗戰期內，人人應有之知識技能爲準則，除供全國民衆閱讀外，並供宣傳人員，中小學校教員及大中學校學生參考閱讀之用。

乙、本叢書重示實例的提示，不單偏於理論的研討，對於抗戰上必需的常識與技能，作有系統的介紹，對於當前急求解決的問題，作有計劃的解答。

最後，關於本叢書的設計編纂及徵稿出自陳端志、袁哲兩同志的協助爲多。各作家又能在短時期內，百忙之中，共同完成這大時代中抗戰文字的基礎工作，都是使本會和本人非常感謝的。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一日中國文化建設協會書記長潘公展序於上海

# 目次

一	引言.....	一
二	新聞事業者應有的認識.....	四
三	如何造成抗戰高於一切的輿論.....	一七
四	力求報紙的大衆化.....	三八
五	結論.....	四四

# 抗戰與新聞事業

## 一 引言

全面抗戰期間的新聞事業，將如何完成其本身抗戰的使命？這是很重要的一個課題。雖各地的新聞界早就對於這課題加以檢討，各自尋覓適當的答案，已達到縮小篇幅、聯合經營、發刊晚報、減少社會新聞及文藝作品的結論，並且次第見諸實行；但我們倘以為僅僅實行這幾種的措施便可以完成新聞事業本身的抗戰責任，那就可說是認識不足。筆者以為，上述的種種措置，強半是適應新聞事業本身環境的消極行動，算不得新聞事業積極參加抗戰的表現。倘新聞事業者不會忘卻，積極參加抗戰的重要性，那對於左列的幾個問題，就必須加以縝密的檢討。

第一：如何造成抗戰高於一切的輿論？

第二：如何造成上下一致，抗戰到底的意志？

第三如何編印能深入社會各階層普遍傳播於前後方的報紙。

這三個問題，突然看去，雖好像非常簡單，但一經精細推敲，便知道每一問題都是非常複雜的問題。因為倘要造成抗戰高於一切的輿論，代表各派別利益的各個新聞事業者，就必須先把派別的利益放在抗戰之下，無條件擁護抗戰，不在抗戰期間的報紙上提出政治問題，求貫徹派別自身的主張；倘要造成上下一致協同抗敵的意志，則代表各派別利益的各個新聞事業者，就不僅不能因自身的某項目的未曾達成，而出冷淡的態度，並且要積極地把自身經營的新聞事業貢獻到抗戰之前，在全面抗戰中間展開新聞事業的抗戰，以本身的無條件協同抗戰為全國上下一致協同抗戰的槩範，務使全國四萬七千萬人的心化為一心，全國四萬七千萬人的力化為一力，而達成意志統一力量集中的目的。此外倘要編印能深入社會各階層普遍傳播於前後方的報紙，就必須把目前專為供奉後方中上層階級而編輯而發行的計劃加以修正，重新定出一種適合各階層閱覽程度和購買力的編輯發行方針；然後問題纔能夠解決。

上述三問題的結論，第一是求全民族注意的集中，第二是求全民族步驟的統一，第三是要使



都市的富貴人和鄉村的勞苦人，前方的士兵和後方的民衆，同樣能夠享到新聞事業的利益，同樣能從報紙上知道抗戰前途的發展，和抗戰期間種種的需要，不會因爲生活程度的參差而對於抗戰發生不同的認識。

本書一方是說明新聞事業者在抗戰期間應有的認識，一方是把筆者的意見貢獻給抗戰期中的新聞事業者，希望各個的新聞事業者，能夠爲着這一次關係整個民族生死的全面抗戰而致其最善的努力。

## 二 新聞事業者應有的認識

在抗戰期間，新聞事業者應站在比陸海空軍將士更前的一線，去做保衛民族的先鋒。爲什麼呢？因爲新聞事業者是輿論的代表，而其所代表的輿論，實是種種政治集團的意見，倘這種種政治集團已都同意於抗戰的原則，並在事實上動員抗戰，那這成爲各個政治集團喉舌的各個新聞事業者，就必須爲着抗戰而運用其輿論的領導力，來領導全面的抗戰，所以他們在抗戰期間，應站在比前方忠勇將士更前的一條戰線，然後纔不會失去代表輿論的地位。

但怎樣纔能舉站到最前線的實際呢？我的答案，是要先有一致禦侮的精神。我們須知：不要說一國之大，一定有各種不同的政見發生於其間，就是二三十人組成的團體，也自有其不可強同的意見，但內部政見儘管不同，而對外作戰卻不能不採取一致的步驟。假如對外作戰的步驟不能一致，那就是授敵人以各個擊破的機會。尤其是像我們這樣國防不很鞏固的國家，更有一致對外的必要。所以，我們的各個政治集團之間，不論是有多少不易調和的矛盾，都不宜在抗戰的中途，有意

無意地把內在的矛盾透露到公開的刊物上面，並且還要使成爲各政治集團喉舌的各個新聞事業，深切了解抗戰高於一切的意義，把編輯室中的每一滴墨水，排字房中的每一顆字粒，都作爲鼓吹抗戰、擁護抗戰的用途，務使敵人不論在任何刊物上面，都找不到我們內部不一致的弱點。

筆者說到這裏，當然該說明一下所謂內部不一致，對於抗戰會有什麼實際的影響。但空洞的抽象的說明，殊不易顯示筆者的真意，因此就不得不舉一二實例，使這說明臻於具體化。

（例一）本年十月十七日下午三時，東京無線電播音，述及日本同盟社特派員和他的海軍將領的問答如下。同盟社特派員問：「上海戰線最近的動態怎樣？」海軍將領答：「沒有什麼變動，日軍依然在陸海空軍協力之下，照着既定的計劃作戰。近來聽說國內有一部分人，非難軍事行動的不能迅速進展，其實，上海戰局受了地形的限制，迅速進展，談何容易！」問：「南方戰事如何？」答：「南方戰事方針，主要是轟炸。至於海面封鎖，是非常辛苦的事，而兵士的辛苦，可以說是超過於實際。」又十月十五日，日第三艦隊司令末次大將對新聞記者說：「目前時局，比日俄戰爭更重大而嚴重，日本如不能努力貫徹其預期的目的，收穫美滿的結果，則前途非常危

險。」這不都是很平常的話麼？然而十月二十一日申報的專論著者金仲華，卻在這寥寥幾句話中間找到敵人的三個弱點：一、證明日本國內，現在確實有人非難軍事進展的不能迅速；二、日本軍事當局已老實承認要迅速進展決非易事；三、證明日軍士兵作戰中所感受的困難和痛苦，實非局外人所能想像；因此便以「敵人軍事上的第一次搖動」命題，謠笑敵人在新聞宣傳中間，「無意的顯示了這種動搖的象徵」並且高呼道：「侵略者已經在搖動了！他們已經想見着對華侵略碰壁之後，對於日帝國主義前途的悲劇了！」

(例二) 日本軍部及軍部所控制的內閣，把這次對華的侵略戰爭，解釋爲「膺懲行動」，並且指出「日本膺懲的對象，是中國政府，不是中國人民。」恰巧日本前駐德大使本多熊太郎在蘭公園的國民大會中，發表了和軍部完全不同的意見，他說：「日本口口聲聲要替中國人民謀幸福，但我以爲日本在替別國人民謀幸福之前，最好先使本國的人民有吃有穿；日本自身是一個窮困的國家，人民衣食所需，均仰給於中國；日本工業最發達的是紡織，而在江南的日本紡織業，占日本全國紡織業百分之二十，每年可得贏餘七萬萬，日本人民身上所穿的汗衫、棉背心、

裏褲等，均係沾此贏餘的餘潤，今戰爭破壞了此巨大的利源，倘更爲長期的戰爭，日本國民靠什麼來維持其衣食？於是乎我們申時社的記者，就把他列入「戰時日本百態」第一節裏面，認本多的矛，足以攻陷軍部的盾。

(例三) 十月一日日本的都新聞揭載了要求早日結束戰爭的社論，上海各報也都把他的要點摘錄出來，藉以顯示日本輿論界對於侵略戰爭的懷疑和動搖。

(例四) 我們的報紙，對於成爲日本內部不安和矛盾的焦點的政黨與軍部的鬭爭，及共產革命運動，在戰前就已多所紀載，到得「七、七」和「八、一三」的戰爭相繼爆發，就更樂於傳播。

上面這幾個例，都是我們欣幸敵人有弱點的例。但我們能在新聞宣傳上面去尋覓敵人國內不一致的弱點，難道敵人就不會從我們的新聞宣傳上去尋覓我們國內不一致的弱點麼？所以我們如果不願也把我們的弱點公開於敵人之前，那我們的新聞專業者就應用「抗戰高於一切」的意識，來編輯我們的新聞，撰著我們的評論，不該爲着一政治集團的利益而輕揭被人視爲不一

致的主張了。

雖說最近的報章雜誌中間，還沒有什麼了不得的不一致表現，似乎還不至為幸災樂禍的敵人所竊笑，但至少已有三點，足以說明某一部分人和代表某一部分人的新聞事業者，還不會完全拋棄政見高於一切的成見。這三點可分述如左：

(一) 民主論的鼓吹 民主論者，最近努力鼓吹民主的重要性，以為民主制度的實行，是抗戰勝利的唯一保證，並且相信這民主運動，就是實行民權主義的運動。

(二) 絕交宣戰論的擡頭 絕交宣戰論者，以為目前的不宣布絕交宣戰，是我們的損失，一旦宣布絕交宣戰，便可以正國際的視聽，可以沒收敵人在華的財產，可以使人民更信任政府，更擁護領袖，甚至可以引起有利於中國的世界大戰。

(三) 積極聯俄論 一部分人以為目前有和蘇聯訂立互助公約的必要，如果締結了這公約，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的遺囑實行起來，中國的抗戰便有勝利的把握，反之，倘不實行此舉，抗戰的前途便不許樂觀。

我們固然知道：在這整個民族生死關頭的抗戰中，除卻共產黨中的托派以外，不論屬於什麼政治集團的人，都不會存心提出麻煩的問題來妨礙抗戰的發展，也不會乘着抗戰這樣緊張的時機，從事劇烈的政治鬭爭，其所以依然不肯拋棄其政見高於一切的成見，大約是因為過於相信自己的政見足以保證抗戰的勝利，逼於一種熾烈的愛國情緒，遂不期然而然地極堅決地提出自己的主張。但不論他們的動機怎樣純潔光明，而其行為則終屬錯誤的行為。因為這種種的主張，既公開刊載於報章雜誌，目光銳利的敵人，就會想像我們中國民主和獨裁的矛盾，還不會得到調和的機會，強硬外交和穩重外交的爭端，還不會得到最後的結論，中蘇同盟論者和反中蘇同盟論者間的意見，也不能一致。他們這種想像，雖不一定就是事實，但他們如果把這種的想像傳播起來，則在加強他們侵略戰必勝的自信上，卻不會沒有相當的效果。

還有一層：試問那些民主論者、絕交宣戰論者、積極聯俄論者，究竟是要煽動的製造輿論呢？還是屬於建議的性質呢？如果是屬於建議的性質，又何不作成建議書建議於政府而必在抗戰期間的報章雜誌上鼓噪呢？我所以說，「不論他們的動機怎樣純潔光明，而其行為則終屬錯誤的行

爲。」

再就上面三問題的本身來說，筆者也有一點意見，現在請分別約述其大要。

第一：民主主義的實行，本是宿題，我們如果反對政府要求人民之「奴隸的服從」，如果信奉三民主義而不割裂其民權主義的全部，那就無疑地要反對不民主的獨裁。不過反對不民主的獨裁是一件事，在全面抗戰期間應否把這宿題加以發揮，來分全國上下對於抗戰的注意力，卻又是另一個問題。我們總該意識到，我們這次發動的全面抗戰，和平常的戰爭不同。平常的兩國或兩國以上的戰爭，多半是爭奪殖民地或爭奪霸權的戰爭，是好大喜功的統治階級殘民以逞的輕舉妄動，或者是一黨一派爲着維持其日薄崦嵫的政權，而以對外戰爭醫治其國內不可調和的矛盾，在這種的戰爭中，反對黨的乘機鼓噪，是無可非難的事實。我們這次的抗戰，是抵抗日本得寸進尺的侵略，是爭民族的生存，爭領土的完整，如果某一在野的政治集團竟也依樣畫葫蘆，乘機鼓噪，那就不免抹煞了這次抗戰的意義。所以，民主論者，如果沒有乘機鼓噪的存心，只是想對於抗戰前途有所貢獻，便應該埋頭尋覓實現民主政治的方案，建議於主持抗戰的政府，或暫將本問題擱置到抗戰



軍凱旋的時節，再行提出。

第二：絕交宣戰的問題，是抗戰技術的問題，這問題專家雖能夠決定，但也要審察絕交宣戰究竟是不是利多於害，然後纔可以毅然決然下一個判斷。目下一般青年，都以爲政府的不絕交不宣戰，是預留妥協投降的餘地，這是完全不了解自己的強點和弱點所在的臆測。他們大概還沒有明白，我們爲着長期的抗戰，需要海外的接濟和國際正義的支持，還沒有明白，絕交宣戰以後，敵人海軍的封鎖和空軍的轟炸，都會成爲合法的行動。其實，絕交宣戰，是一舉手就可以辦到的，但辦到之後，海軍等於零的我們，既不能保護我們的船舶從國外輸入必要的軍需品，第三國的船舶在形勢上也不能替我們解除運輸的困難，這一來，我們和國外的交通就會比目前更感困難。還有一點，自「八一三」以來，日本飛機轟炸我們各都市的行爲，其所以會遭全世界的譴責，半固由於日本飛機不顧一切的國際法。任意轟炸無抵抗的平民，又其半則由於中日雙方都不會正式絕交，正式宣戰，其轟炸絕對沒有理由。我們政府當局之所以暫時不出絕交宣戰的行動，並不是預留妥協投降的餘地，而且相反地是正在利用未正式絕交，未正式宣戰的期間，補充我們的軍需，完成我們的

外交策略，藉以保證我們焦土抗戰的勝利。唯其如此，在我們就非到相當適宜的時機，不必忙着正式宣告絕交或正式向日本宣戰，必須適宜的時機到了我們面前，或者是日本已正式和我們絕交，向我們宣戰，我們纔有正式絕交正式宣戰的必要。

第三：積極聯俄的問題，恐怕是政府當局和全國智識階級都會加以考慮的問題，其所以至今還不會達到締結互助公約的結論，自然有其不易立即締結的原因。一來，和蘇聯有不可分離關係的第三國際，放棄以中國共產黨打倒中國國民黨的計劃，為時過晚，中國國民黨的政府當然不會馬上走到積極聯俄的路，所以我們與其說是中國一向不會積極聯俄，那就不如說是蘇聯一向不會準備和中國攜手。二來，中蘇之間最近已訂立了互不侵犯的條約，倘中國再進一步要和俄國締結互助公約，那這互助公約就當然是軍事同盟。這種軍事同盟，假如能在此時成立，對於中國的抗戰當然非常有利，但對於蘇聯是否有利，就還是疑問。如果蘇聯此時還不會準備對日作戰，不願意自陷於中日戰爭的漩渦，中國難道能以中國的片面要求壓倒蘇聯自身的國策麼？假若不能，那這締結中蘇互助公約的運動，豈不是多此一舉？因為中國畢竟是中國，蘇聯畢竟是蘇聯，中國有中國

此時此地的需要，蘇聯也自有蘇聯此時此地的需要，縱令兩者的邦交已漸趨敦睦，兩者的利害已漸趨一致，然終不能強合兩者爲一談，對於任何問題，彼此也都有其不得不權衡輕重趨利避害而採取單獨行動的苦衷，何況直到而今事實還很顯明地指示着中蘇目前的利害尙未十分一致，中國以蘇聯的立即加入戰爭爲利，而蘇聯則以立即參加對日作戰爲害，我們又何能強求蘇聯的加入呢？三來，縱再退一萬步，承認中蘇兩國的利害完全一致，中國以蘇聯協同中國對日作戰爲利，蘇聯也以中國協同對日作戰爲利，兩者之間，已沒有任何的差別性存在，大有立即締結互助公約的必要。然而我們也還要考慮締結互助公約的目的在那裏？如果說：互助公約的目的，是在於協同對日作戰。那我們又何不逕請蘇聯參加戰爭，而必彎彎曲曲做所謂締結互助公約的運動？如果說：互助公約的目的，不在於此時的協同作戰，而在於將來的協同作戰，那我們就要問：這所謂將來，究竟是不是等日本打敗了中國，浸假威脅到蘇聯的安全的時節呢？萬一是這樣，那此時締結中蘇互助公約的意義，只是適應蘇聯將來的需要，而不是適應中國此時的需要了。既不是中國此時的需要，我們又何必急忙運動締結這種無裨於眼前抗戰的互助公約呢？

要而言之：民主問題也好，絕交宣戰問題也好，積極聯俄問題也好，都不是單純的問題，如果把

他作為單純的問題來處置，那就至少是犯了幼稚病。筆者現在希望為民主熱、絕交宣戰熱、積極聯

俄熱所衝動的自命前進的人們，一方不要忘卻蘇聯放棄以中國共產黨打倒中國國民黨，並熱望

中國共產黨加入中國國民黨、擁護唯一領袖蔣委員長의 動機，是要糾正自己以往分散中國抗日

力量的錯誤，並且促成中國的統一；另一方不要忘卻自己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一切問題的歸宿

點，都要以此時此地的中華民國的需要為前提，纔不會發生舍己耘人的錯覺。大家都要明瞭：蘇聯

最近漸漸認識了蘇聯敵人的真正敵人，是那有名的華北駐屯軍小冊上所指的「蔣介石及其一

黨」，蘇聯為着協助「蔣介石及其一黨」的抗日，已拋棄了強中國蘇聯化的企圖，並且勸中國的

共產黨拿出擁護蘇聯的氣力來擁護與日本軍部站在不兩立地位的「蔣介石及其一黨」，這自

然是蘇聯的勇於遷善，但已往蘇聯所策動的中國共產革命，卻不能說也是高明的舉動，因為如果

蘇聯以前所策動的中國共產革命，不是估量錯誤、認識不清，又何必改絃易轍，今既改絃易轍，便是

自承其已往的估量和認識都不正確。蘇聯已往的估量和認識既都不正確，則基於這種不正確的

估量和認識而確定出的種種路線，就也必然是錯誤的路線。現在自命爲前進的人們，如果在蘇聯已經改絃易轍之後，還要再循着蘇聯的舊路線而邁進，那就真是開倒車的行動了。

筆者說這話，不是不許人發民主熱或絕交宣戰熱，又或聯俄熱，不是要把發民主熱或絕交宣戰熱又或聯俄熱的人們，都歸納到中國共產黨的範圍，也不是指摘共產黨有什麼一誤再誤的事實，更不是懷疑蘇聯的改絃易轍，沒有誠意，只是希望這些發民主熱或絕交宣戰熱又或聯俄熱的人們，深切了解當前時局的嚴重，先把那種爲政見而奮鬥的英勇姿態，用到挽回民族劫運的抗戰上面，等到民族生存有了保障之後，再把自己的英勇姿態用到政見的鬭爭上面；同時並希望這些發熱的人們，要十分認識中蘇共同的敵人究竟是誰，以及現階段中蘇兩國根本政策的綱領究竟是那幾條，客觀地平心靜氣地更英勇一點去做抗戰的工作。目前許多發熱人們中間的，確有不少一知半解的分子，雖隱隱約約知道中蘇的共同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雖也模模糊糊知道中蘇根本政策的綱領，在於各自團結內部，把火一般的熱情，鐵一般的意志，聯成一道任何暴力都不能摧毀的抗戰陣線，但他們卻依然要做他們自己認爲最英勇的政治鬭爭的工作，這在我們看來，實在

不是很好的現象，這種現象，如果時常反映到新聞事業者所經營的報紙上面，那這個報紙就會成爲授敵以隙的報紙，會使我們的抗戰受到不利的影響。我們須知，我們此時所以樂於聽到敵人國內自相矛盾的消息，就是希望敵人能以自己的左手打自己的右手，然而敵人也一樣樂於聽到我們國內自相矛盾的消息，也一樣希望我們以自己的左手打自己的右手。

上面一些話，看來好像是完全討論政治問題，不是專對新聞事業者而發，但說到實際，就還是專爲新聞事業者而發。因爲代表各種勢力的團體，都是政治的集團，而新聞事業則又爲各種政治集團的喉舌，成爲政治集團的前衛。

### 三 如何造成抗戰高於一切的輿論

晚近經濟學者的老生常談，是巴黎嘎治廠的一粒牙粒，蘭開夏紡織工場的一絲纖維，加立福尼亞農場的一粒小麥，都和全世界經濟有密切的影響，都和全世界人類生活有不可分的關係。我們如果把這種理論適用到抗戰上面，那就要說，我們全國從極大到極小的一切人力物力，也都和這次的抗戰有密切的影響，有不可分的關係。就人力來說，則不論是智識力、勞働力、戰鬪力，都是抗戰的人力，就物力來說，則不論是陸海空軍作戰的戰具，人民衣食住行所需的一切物質都是抗戰的物力。這些的人力物力，必須全部用到抗戰上面，然後我們中國纔真是蔣委員長九月二十四日對各國駐京記者所說的「實一威力無窮、財力無盡之國家」也只有這種威力無窮、財力無盡的國家，纔能够戰勝頑強的敵人，為公理正義伸張勢力，使公理正義的一切敵人都屈膝於公理正義的面前。一切的人力物力既都必須為抗戰而貢獻，那新聞事業所包含的一切人力物力，也當然該無例外貢獻到抗戰之前。經理室的一切設計指揮固應念茲在茲地膠着在抗戰上面，編輯室的每

一滴墨水，排字房的每一顆字粒也必須念茲在茲，爲抗戰而揮灑，爲抗戰而運用。換一句話來說，就是包含着新聞事業者和新聞記者兩部分人的新聞事業，應該爲抗戰而貢獻其所有的力量，爲抗戰而犧牲其派別的利益，纔可以算得盡了新聞事業者所應盡的天職。

至於怎樣做法，纔算得真是爲抗戰而貢獻其所有的力量，爲抗戰而犧牲其派別的利益，這雖然也是很大的問題，但我們敢說，只要新聞事業者能用抗戰高於一切的意識，來造成抗戰高於一切的輿論，便是真正的大貢獻，真正的大犧牲。

記得郭步陶氏在其所編的本國新聞事業（申報新聞函授學校講義）裏面，有下面的一段話：『新聞記者常站立在社會最前線，對於百般事物，皆應有透過一層的觀察。一件有益於人羣的事情的形成，常須經過相當時期的培植，一件有害於人羣的事情的發生，也必經過若干時日的醞釀。在牠們將形成未形成，將發生未發生的當兒，一般社會常常分辨不清楚那一個是有益，那一個是有害的，甚至把有益的當作有害的，有害的當作有益的。在他們自己，還以爲事情的真相原來如此，卻不曉得他們助成和誣罔的罪惡很是重大。辦理新聞事業的人，本觀微知著的精神，在事態未



十分明著以前，便詳為分析，細為陳說，使一般社會的人們，知所從違。這是新聞事業中，評論方面，解釋新聞和創造輿論的一種最大功用，叫做導師，可也不算過分罷？」在這幾句話裏面，除卻新聞記者一名辭或許要改作新聞事業者，纔更適合實際的情形以外，其餘的話都很對。因為「培植」一種勢力或抑制一種勢力，要「醞釀」一種風潮或遏阻一種風潮，本都是新聞事業者所優為的事，他們不僅可以運用「解釋新聞」和「創造輿論」的方法，來「培植」或抑制一種勢力，「醞釀」或遏阻一種風潮，還可以用特寫、煊染、刪減或封鎖的方法，處置和一種勢力或風潮有關的新聞，用贊成、反對、煽動或挑剔的論調對待和一種勢力或風潮有關的人物；縱令新聞事業遭遇非常嚴厲的統制，言論紀載都不十分自由，然統制的罅隙中，仍有新聞事業者可以運用手腕，製造輿論的餘地，而新聞事業者也畢竟不會失去掌握輿論的權威。

「輿論」既操在新聞事業者的掌中，則在這全面抗戰期間，新聞事業者就不能辭卸其造成抗戰高於一切的輿論的責任。筆者所以提出如何造成抗戰高於一切的輿論一問題，籲求國內的新聞事業者共同研究，其命意不僅希望全國的新聞事業者，能把抗戰再昇一格，讓他佔據至高無

上的尖端，同時把自己所代表的一部分人之政治的社會的立場，思想的行動的生活，放到抗戰的下面，而且希望全國的新聞事業者，能夠同時發動造成輿論的力量，來創造抗戰高於一切的輿論。

「創造輿論」一辭，最初是見於新聞學綱要一書，著者是徐寶璜。徐氏說：「新聞紙不僅代表輿論也，亦應善用其勢力，立在社會之前，創造正當之輿論，而納人事於軌物焉。」這就是「創造輿論」一混合辭的定義。至於創造輿論的方法，徐氏曾列舉三點：「一爲登載真正之新聞，以爲閱者判斷之根據；二爲訪問專家或要人，而發表其談話；三爲發表精確之社論，以喚起正當之輿論。」但這三種方法在非常時實不夠應用，而且還有不盡適用的地方，因此筆者不得不進一步提出左列的方案：

(一) 刊載新聞以有利於抗戰爲條件 本來新聞方法和政治方法，沒有異致。政治方法是在爲大多數人謀最大幸福的目標下面，用種種的力量去做充實大多數人生活或維持大多數人生計的工作，把少數人的利益，放在大多數人利益的後面。軍事方法，是在嚴守紀律下面，協同動作，把有利於全軍的影響擴大起來，把不利於全軍的影響彌補起來，務使勝利的影響能

够及於全軍，失敗的影響能够局限於一隅。新聞方法也一樣須以大多數人的福利爲前提，以顧全大局爲歸宿。所以我們最好是用左列的方法，來處理抗戰期間的新聞。

(甲) 發動新聞的全面抗戰。怎樣發動新聞的全面抗戰呢？就是要把全部的新聞地位，做抗戰的紀錄。一方傳佈抗戰發展消息，描寫抗戰實際狀況，報告社會各階層爲抗戰而活動的事實，描寫前線忠勇將士犧牲的壯烈，另一方則將各種和抗戰有聯繫的新聞，像歐美各國當局對於中日戰爭前途的觀察，國聯和參加九國公約各國的態度，敵人內部自相矛盾的情形，和專家估量中日兩國作戰的經濟力兵力的談話等等來配合抗戰發展的消息。務使報紙的新聞欄上面，充滿着整個民族堅決抗戰的精神，並使全國的閱報人的注意力完全傾注於抗戰。

(乙) 封鎖足以暴露自身弱點的消息。積極地發動新聞的全面抗戰，固然是目前最迫切的需要，但封鎖足以暴露自身弱點的消息，也是此時此地的需要。因爲我們中國最近雖已走上現代國家的路，但封建社會的歷史情性，依然還在進行，從光明面看去雖然已是沒有缺點的現代化的統一國家，但從黑暗面看去，就還有許多封建社會所陶冶的人物，正在利用國家生死

存亡其間不能容髮的時機，做投機性的政治活動，或逕行出賣整個民族的利益投到敵人的懷抱去做敵人的走狗反噬他的祖國。譬如最近兩月來，一小部分人利用抗戰期間各方面都忙着抗戰，無暇顧到一部分青年失學失業痛苦的時節，便把這一部分青年組織起來，標榜其所謂民主陣線，極力製造非改革政制不足以保證抗戰勝利的空氣，求達其危詞聳聽的目的；以及身居要衝的簡任秘書黃濬，竟爲了每日四百元的收入去做敵人的走狗，就都是黑暗面還有黑暗勢力存在的證明。但這兩種人，雖同是代表黑暗面的黑暗勢力，而政治投機者的手腕，卻非常高明。政治投機者會告訴那些失業失學的青年，現代是獨裁的時代，我們決不反對獨裁，但我們雖不反對獨裁，然而卻主張民主的獨裁，因爲服從民主的獨裁，是紀律的服從，服從不民主的獨裁是奴隸的服從，所以我們應該爲着實現民主獨裁的理想，更英勇一點走上政治鬭爭的最前線；他又會告訴失學失業的青年，蘇聯是民主獨裁的國家，可見民主獨裁的思想是前進的思想，如果你不願做時代落伍的青年，那就請你加入我這個民主的陣線。同時，他們還會指出若干怕死的軍官，貧污的官吏，可殺的漢奸，所以能够存在的原因，全在於獨裁和民主的不相聯繫，藉以證明

他的組織民主陣線，正是此時此地的需要。惟其如此，所以現在的新聞紙雖決不會為漢奸所利用，但有時卻會供政治投機者的利用。新聞紙供政治投機者利用的結果，自然是把所謂民主和獨裁的鬭爭暴露在敵人之前。因此，筆者希望今後的新聞事業者能把這種有授敵以隙的危險的新聞，或演辭，又或播音稿加以封鎖，務使抗戰不至因少數的政治投機而蒙不利的影響。除此以外，還要注意封鎖下面的幾種投稿：(1)指摘後方服務人員的不出力；(2)斥責後方醫院為傷兵服務的不周到；(3)指陳戰區民衆不協助忠勇將士抗敵的事實；(4)攻擊當局救濟難民的沒有誠熱；(5)詆譭當局的不替失學失業青年謀出路。因為，後方服務人員的不出力，後方醫院服務的不周到，民衆的不協助將士抗戰，當局救濟難民的不甚澈底，官吏對於失業失學青年的不注意安插，差不多都是屬於例外的事實，我們不能用少數的例外，來代表全體的事實。

(丙) 將教育的方法滲入新聞 報紙上面的新聞，本都是社會的活教本，其自身就含有教育的意義，我們又何必再把教育的方法滲入新聞中呢？然而我們也要知道，新聞本身雖是社會的活教本，但這活教本的讀者不能沒有見仁見智的不同，既有見仁見智的不同，則同一新聞

所收教育的效果也可有正反的差異。這在平時固然沒有關係，但在這抗戰期間，卻有非常重大的關係。因為在這抗戰期間必須四萬七千萬人能夠有同樣明瞭的民族意識，同樣堅強的民族意志，同樣熱烈的民族情感，同樣奮發的民族精神，又能夠用集中的力量、整齊的步伐來參加抗戰，然後最後的勝利纔會屬於我們，倘有見仁見智的不同，向左向右的差別，便足使抗戰前途漸趨於黑暗。時勢既是這樣，那我們以代表輿論指導輿論並創造輿論自居的新聞事業，就有將教育的方法滲入新聞的必要。至所謂教育的方法，非常單純，初不外用說明、解剖、尋繹意義、供給參考資料的形式，使同年級同課室的學生對於同一教本發生同一的觀念。這種方法倘能用到新聞上面，必然足使閱報人們的意識、意志、情感、精神完全一致，同為抗戰而忍耐最大的犧牲。現在請將實行的辦法，寫在下面：（1）說明方面，是對於新聞，說明其歷史、地理、人物，或其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文化的價值，使人一望而知其關係的是否重大。（2）解剖方面，是將新聞可疑之點，加以分析，使人見微而知著，不會輕輕放過似不重要而實甚重要的新聞。（3）尋繹意義方面，是對於富有含蓄的名人言論，或莫測高深的名人行動，下一番研究工夫，去尋覓其所包含的意義。

即以研究所得的意義，公諸閱者。(4)供給參考資料方面，是在披露一種新聞或一種議論之際，預料一般人將有芝草無根，醴泉無源的感覺，而又無暇說明其淵源，尋繹其意義，於是乎便從書籍或報章雜誌中，鈔錄一段和這新聞有關係的史實或印出一角地圖，以素材供人參考。

(二)著作評論應聚精會神擁護抗戰。在抗戰期間的報紙，刊載新聞固應以有利於抗戰為條件，而著作評論則尤應聚精會神擁護抗戰。目前全國各報主持筆政的先生們，雖已都為着抗戰而著作評論，然而抗戰高於一切的輿論卻還不會真個創造成功，這究竟是什麼緣故呢？筆者敢大膽說一句，是因為那些新聞事業者和自命為大主筆的先生們，還不會拿出最大的勇氣來克服自己的緣故。新聞事業者為着迎合一種社會的心理，或執行自己一小集團的戰略，常常把整個民族的利益放在腦後，一般自命大主筆的先生們，也常有這種傾向，所以他們雖有顯微鏡似的一副眼睛，能透視一般人看不見的事物，但卻也有看不見整個民族利益究竟何在的時候，因而他們便忘卻了造成抗戰高於一切的重要性。雖然，現在是抗戰應該高於一切的時代了，如果處於創造輿論地位的大主筆先生們，還不肯丟下一切派別的意见，丟下一切迎合某種社會心理的企圖，把三

千毛瑟無條件貢獻到抗戰上面，那抗戰的前途，就真非筆者所忍想像了。筆者的愚見，如果大主筆先生們願意造成抗戰高於一切的輿論，那就應該用左列的態度和方法撰著他的評論：

（甲）在抗戰高於一切的原則下不容再寫但書。寫但書是在野政治家慣用的狡猾手腕，他對於在朝黨的任何主義政策，幾沒有不贊成其原則的，然而一經加上但書，他的贊成論卻會變成了反對論。這種但書的方法，在英國巴力門裏面最爲流行，往往政府黨提出一個議案，在野黨在劈頭總是贊成，不過他在贊成之下，卻會說是但若依照你們的辦法做去，其結果一定和你們用以號召國人的動人的好政策完全相反，所以我們不得不反對，這一來他就分明是處於反對的地位了。現在我們雖沒有像英國那樣的巴力門，足以發揮政治家狡猾的手腕，然而我們的新聞紙卻也正像英國的巴力門，同樣成爲政治家發揮政論的機關，許多在野政治家也很懂得利用這機關，透過新聞事業者和大主筆先生們的手，發表像贊成而實是反對的議論，譬如最近若干報紙的評論，驟看過去，好像都是信任政府擁護領袖贊成抗戰到底的論調，然實際上卻都加了但書。有的說：「但畢竟非民主制馬上實現，不足以保證抗戰的勝利；」有的說：「但此時



非馬上絕交宣戰，不能使抗戰向着更有利的方面發展；有的說「但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是中山先生的遺囑，我們既發動全面的抗戰，就應該馬上和蘇聯訂立互助公約，打倒我們共同的敵人，然後最後的勝利纔會屬於我們。」一言以蔽之，都是以某種辦法的實行爲其贊成抗戰到底的條件，我們與其說他是擁護抗戰的政策，就寧說他是正利用對外抗戰的機會，發動對內的政見鬭爭，與其說他是好意的貢獻，就寧說他是惡意的恫嚇。因爲實際上，他們是用「倘不照我的辦法來抗戰，那你所發動的抗戰就會失敗」的恐嚇論調，來要挾政府，要挾領袖，甚且可說還有「假如將來抗戰失敗，那這失敗的責任應由你們來負」的存心。這種做法，不論用如何的理由來辯護，都不能掩護其破壞抗戰的形迹。因爲兄弟雖不妨閱牆，但在這抗戰的期間，終不能不先放下閱牆的手，共禦外侮，今若干在野的政治集團或自由人，一面說是願意共同禦侮，又一面卻不會停止閱牆的工作，這又如何能夠掩其破壞抗戰的形迹呢？筆者現在一方希望各報大主筆先生們的自身，先移閱牆的精神，用在抗戰上面，不要再在抗戰高於一切的原則下再寫但書，作附條件的贊成和擁護。另一方希望他們在發刊「專論」「來論」「選

論」的時節，能避免自己的供人利用。大家都應該知道：爲着抗戰而信任政府，擁護領袖，並不是在野者的卑怯，乘着抗敵日益緊張的期間，發動政治的鬭爭，也不是在野者的英勇，在此時此地，只有「屈膝」在日本帝國之前，纔是難以言語形容的卑怯，只有一致參加抗戰，纔是迥異尋常的英勇。

(乙)努力闡明抗戰的意義 這次的抗戰，一般人雖都知道是爲着救亡，但還不十分明瞭他的內容。報館的主筆們，當然應負隨時隨地爲一般人說明其內容的責任。至於應說明的範圍，則約如下述：(1)這次日本發動「七、七」和「八、一三」的侵略戰，是要達到所謂華北明朗化或特殊化的目的，而其所以在吞下東北四省還不會完全消化的時期，又冒這大險發動侵略戰，那是因爲恐怕將來沒有機會的緣故。他何以知道將來會沒有機會呢？是因爲他所認爲在勢和日本不能相容的「蔣介石及其一黨」在這幾年間，已奠定了生聚教訓的基礎，完成了許多組織民衆、充實國防、團結內部、集中國力的工作，浸假要將日本這幾年慘淡經營的冀察平津，作爲收回東北失地的根據地；使他想到，日本倘不及此時進攻中國，將來的中國便會變成銅

牆鐵壁難攻不落的國家，不僅冀察平津不能澈底特殊化，就是東北四省也有被收回的危險，於是乎便發動了這次的侵略戰。日本既發動了侵略戰，便當然要揭發戰爭的目的，也當然希望中國反國民黨的封建勢力的復活。現在他已揭示了戰爭的目的，說是要從根本上消滅中國戰爭的意志，使中國向日本屈膝；要粉碎中國的國民黨使其不能存在；並且到處宣傳，說日本現在只是攻擊中國國民黨，並不是攻擊中國人民；一方是表示日本不容中國國民黨存在，一方是希望中國封建餘孽或其他反國民黨的勢力，崛起搗亂，搖撼抗戰的陣線。日本發動侵略戰的目的和方法，既是這樣，那我們所用以答覆日本的，也就當然是舉國一致地信任政府、擁護領袖、奮鬥到底、抗戰到底的事實。關於這一點，各報的評論記者，是應該為一般人說明，使一般人都能有清清楚楚的認識，知道如果在這個時期，再來做和信任政府、擁護領袖不相容的鬭爭工作，就是幫助日本侵略中國。(2) 為什麼我們應以信任政府擁護領袖來應付日本呢？因為一個國家必然需要一種成為國家重心的勢力來支持，現在我們的政府和領袖，正是我們國家的重心，日本要征服中國，固然以消滅我們的重心為先務，而我們要保全中國，也以信任政府、擁護領袖為前提。但

這種理論，一般人是不会了解的，就是思想極明晰的人，也往往因為受着另一種空氣的蒙蔽，以致沒有深切的了解。譬如蔣廷黻氏總不能說不是思想明晰的人罷，然而三年前的蔣廷黻對於這件事，也就沒有正確的認識，後來因為看到日本華北駐屯軍散發的一種小冊，說是現在的局勢，不是日本屈服，便是由日本打倒「蔣介石及其一黨」，這纔恍然大悟，蔣委員長和國民黨是中國的重心，也是日本征服中國的障礙物，因而一反向來反國民黨的態度，轉而踏上信任政府、擁護領袖的大路。這就是一個實例：蔣廷黻尚且如此，則一般人更可想而知。所以報紙的評論記者，實有說明理由，使人知道信任政府、擁護領袖，確是救國最好方法的必要。(3)軍事和外交都必須經過精密的設計，然後纔會得到有利的結果。現在政府裏面軍事、外交的人才都不缺乏，決不會有遺策，實在不需要一般人的代謀，然而現在一般的青年，卻偏喜歡議論軍事外交的得失，以為自己的見解遠在軍事專家外交老手之上，這也是不很合理的現象，評論記者對此尤應切實糾正。(4)這一次的抗戰，是決定整個民族生死的抗戰，必須能夠獲得最後的勝利，然後整個的中華民族纔會從日本帝國主義的束縛下解放出來，萬一抗戰失敗，中國便會繼朝鮮之後，成

爲日本的殖民地，整個民族都不得子子孫孫做日本人的奴隸。但欲爭取最後的勝利，必須付出極大的代價，因而不論什麼人，都應該準備以最大的犧牲，作爲對於抗戰的貢獻，遇到生命的犧牲也好，財產的犧牲也好，職業的犧牲也好，學業的犧牲也好，都應該認爲分內應有的犧牲。然自「七、七」迄今，所經時間，不足四個月，除死者絕無怨言之外，其餘無家可歸的難民，無業可就的職人，無工可做的工人，無學可求的學生，就都時常把抱怨政府不設法安置的怨聲，傳到報紙上面，這豈不是不能忍耐犧牲的表現麼？連這短期間，小範圍的犧牲都不能容忍，則所謂不辭一切的犧牲，豈不是不能兌現的支票？萬一這次的抗戰期間竟延長到五六年，損失範圍更比目前大到幾十倍，那些犧牲者又該怎樣抱怨政府呢？這一問題，是很值得考慮的。因爲，我們總該知道：政府不會在抗戰的前夜，移動民衆和民族工業，不會預先對於失業失學乃至戰區被難民衆的處置，加以縝密的考慮；又不能於事後速籌萬全的補救方法，這固然是政府當局的不是處；但在此時此地的中國，政府財政是不是足夠解決這些問題；在急轉直下的「七、七」和「八、一三」的局勢中，時間是否允許政府雙管齊下，一面動員進行抗戰，一面做移動民衆和民族工

業以及救濟難民、救濟失業、救濟失學的準備工作；就也都有些疑問。並且這次的抗戰，是全國性的對外戰爭，而戰爭的方式又無疑的是立體的戰爭，何處是戰場，何處是安全地帶，誰也不能預先決定，因而何處將有難民，何處將有失業者，何處將有失學者，以及這難民、失業者、失學者的數量究竟是多少等等的問題，也連帶的不能解決。在這種情形下面，我們如果認政府事前的無準備事後的張皇失措，全是政府的無能或是無誠意，那就簡直是錯誤的認識。惟其如此，所以現在橫着我們面前的問題，雖是如何移動民衆，如何移動工業，如何救濟難民，如何救濟失業，又將如何救濟失學等等的難題，但我們卻不能完全責成政府來解決，也不能期待十分圓滿的解決；只能一方希望政府有臨時應急的措置，另一方則由社會各界通力合作，出錢出力，分別問題的緩急，逐步進行其解決的計劃；倘在政府的應急措置和社會各界的通力合作下面，仍有暫時不得不忍受顛沛凍餒，失業失學種種痛苦的人們，或較長期間內不得不忍受顛沛凍餒，失業失學痛苦的人們，就只能看做抗戰的必然犧牲。然而一般人，對於這些問題，都沒有切實的認識，而智識階級中人又往往只看得難民的流離失所，和失業失學者的徬徨歧路，不會想到政府從事抗

戰的急迫和煩難，因而時揚其非難政府之聲。現在我們希望各報的主筆先生們，對於這些問題，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加以解釋，一方勸犧牲者忍受抗戰期不可避免的犧牲，一方則勸社會各界通力合作，出錢出力，來解決這情形既極複雜、性質又頗嚴重的問題。

以上所述編輯新聞和撰著評論的方法，也許是有點太主觀的地方，亦未可知，不過就大體來說，總和此時此地的需要相距不遠，因為此時的需要，是趕快造成抗戰高於一切的輿論。

(三) 如何推動整個民族的協同動作 抗戰需要輿論的擁護，更需要整個民族的協同動作。必須整個民族能夠協同動作，然後纔有總動員的可能。因總動員的目的，在於傾全國的人力、物力，支持抗戰，而欲到達這種目的，又必須先求一切人力、物力的緊密聯繫，然後纔能够把有緊密聯繫的人力與物力，表現在總動員上面。這種提倡聯繫人力與物力的責任，也應該屬於新聞事業者。至於如何聯繫人力與物力，使每一分的人力、物力都能够有益於抗戰，雖是極複雜的問題，但我們不能因其複雜，便不謀切實解決的途徑，更不能因為實行這聯繫的關鍵，仍在於政府的法令或社會團體的規約，認為徒然提倡無濟於事。我們要知道：我們中國，雖正如蔣委員長所說，是一個

威力無窮財力無盡的國家，但人力和物力或人力與人力、物力與物力之間，如果沒有緊密的聯繫，那這無窮的威力和無盡的財力，也就絲毫無補於抗戰的前途。譬如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現象，就都是人力與物力、或人力與人力、物力與物力不能聯成一氣的現象。第一：抗戰需要軍費，政府發行五萬萬元的救國公債，便是供軍費的用途，然而募集至今，卻還不會達到預期的數字，而另一方則據路透社的報告，中國人的現金現銀，現已裝滿了香港各銀行的倉庫，但依然還在不斷的運進，這是多麼矛盾的現象？假如我們能把這種財力和抗戰的武力聯成一氣，區區五萬萬元的救國公債，既不至今還不足額，那些有錢人的金錢就也不用耗費很大的運費運到香港去保存。第二：現在各都會熟練的技術人員和工友，都因事業的停頓工廠的閉門，而徘徊於失業的末路，各工廠老闆也因為資金周轉的不靈，和工廠所在地的不安全，無法開工，感到事業行將失敗的苦痛，然而另一方面都正感到工業生產停頓的有害抗戰，而又有不知如何纔可以集合工業經營者和熟練工人於安全地帶使他恢復經營的苦悶，就是擁有多量資金的金融界，也正因為資金的沒有出路而失去活動的勢力，假如我們能替這兩方面謀一合作的辦法，豈不足使停頓的工業，失業的工友，停



滯的金融，社會的需要，都聯繫起來而各得其所麼？第三：我們的都市和鄉村，形成了一種相隔天淵的對照，都市患了智識充滿患，苦無排洩的處所，鄉村則患了智識貧乏症，也苦無輸入智識的方法，都市的智識階級羣，正爲着智識的沒有出路，背負着說不出的煩悶和痛苦，蹣跚在失業的十字街頭，而鄉村無智的農民羣，又常常爲着要解決寫一封信或是寫一張契約的問題，須費去半日或一整日的尋覓代書人的時間，如果這兩者能够互相幫助，豈不也是一舉而解決兩個問題的好辦法？第四：有錢人常常爲着子弟求學而苦無理想的學校，而貧窶的教育家又常常因爲要辦一個比較接近理想的學校苦無財力而發愁，而這兩者之間，又不能發生聯繫，以致欲辦理想的學校者終於不能辦成理想的學校，希望有理想學校可供子弟求學者也始終有找不到的感慨，現在我們如果能使這有錢人和有理想的教育家合作，在教育問題上面不是至少可以減去國家社會一二分的憂慮麼？此外，缺乏學校的內地青年，常常因爲出外求學，耗費許多的川資和時間，其缺乏川資的，就只好灰了升學的志願，加入失學的羣中，而學校過多的各都市，又常常爲着招生感到非常困難，如果我們能把這需要學生的學校移到內地使他 and 有志求學的學生聯繫起來，也就是可稱兩便。

的方法。第五：目前許多戰區的難民，正流離顛沛，尋覓不到一個歸宿地，而內地僻處一隅的鄉村，則儘有軒廠而無人居住的僧廟和宗祠，讓狐狸豺狼窟穴於其中，流離無告的難民中，不乏經驗宏富的農民，目前正苦無地可耕，而各處的官地或公地，又多半長着蔓草，成爲蠅蚊的搖籃地，倘這種遭難農民能和那些僧廟宗祠官公土地發生聯繫，那就不僅各大都市的難民厲集一問題，不愁沒有方法解決，就是內地如何處置荒地化無用爲有用的問題也會隨而解決。第六在廢物利用一觀念不甚發達的中國，往往發生一種矛盾的現象，一方是需要者頗爲物的缺乏所苦，另一方是物的所有的又愁無法處置那個實在有用而在他則爲無用的物。在這矛盾現象之中，尤以破銅爛鐵之需要與供給的聯繫爲最不緊密。許多人家，擁着有破洞的鐵器，斷碎的銅條鋼片，留着既無所用，棄之又覺可惜，結果是永遠把他放在角落裏，讓他自鏽自爛，另一方則銅鐵店的老闆，懸着重價去收買破銅爛鐵，終於買不到足用的數量，於是只得向外人購進大批的銅鐵，如果我們能想出一種辦法，使擁有破銅爛鐵的人們和需要破銅爛鐵的銅鐵店老闆發生聯繫，使廢物變成有用的物，則對保存國家實力上面，就也可有相當的貢獻。由此可見，人力與物力的聯繫，或人力與人力物力與物力

的聯繫，必須緊密，然後人力與物力，纔會發生最大的效率，最大的作用，和最大的威力，中國纔是真正威力無窮財力無盡的國家。

至於聯繫人力與物力或人力與人力、物力與物力的方法，當然是該求之於政府法令或社會團體規程之中，但這種法令和規程，有的是頒布訂定不久，一般人還沒有切實的認識，有的是不會頒布訂定，仍有待於專家的設計，因此新聞事業者在此際，必須努力提倡，對於已頒定訂定的法令規程，應設法宣傳，造成一般人樂於實施的心理，對於尙待專家設計的法令規程，應設法供以必要的參考資料，貢其自己考慮所得的意見，務使人力與物力或人力與人力、物力與物力的聯繫問題，能在最短期間獲得一圓滿的解決。

人力與物力或人力與人力、物力與物力之間，如果能有緊密的聯繫，整個民族也就有了協同動作的可能。整個民族的協同動作有了可能，則總動員的問題便隨而解決，能解決總動員的問題，我們抗戰的最後勝利，也就有了更切實的保證。關於這一點，筆者希望全國的新聞事業者能有深切的認識，能隨時隨地利用新聞紙的力量，來盡提倡鼓吹造成普遍觀念的責任。

#### 四 力求報紙的大眾化

我們中國的報紙，一向是專供都會中上層人閱覽的，所以都市中上層階級對於報紙雖會說是「我們的報紙」，但在都布下層的人和鄉村的農民，就會說這不是我們的報紙。

然在平時，報紙的政黨派別化，及其離開大眾，只代表一種勢力的做法，是無可非難的，但在這抗戰期間，卻有深入社會各階層的必要。因為要從抗戰中取得最後的勝利，便不能不發動全民族的抗戰，而我們民族至今還沒有超過農業的時代，農民數量佔着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如果這些農民心目中都沒有「這一次非抗戰到底不可」的觀念，那抗戰的前途，就的確不許十分樂觀，同時前方的忠勇將士，後方的生產工人，文化的水準雖較一般農民為高，終究有多數人還看不懂現在的報紙，而報紙所欲傳播的「這一次非抗戰到底不可」的觀念，也就非他們所能吸收，所以我們如果要造成「這一次非抗戰到底不可」的觀念，那我們就必須利用我們的報紙，做廣播抗戰觀念的播音臺，而欲使報紙成為廣播抗戰觀念的播音臺，便要先解決兩個先決的問題，其一是

報紙新聞和評論的大衆化，其二是報紙賣價的大衆化，必須能夠做到這兩點，一方使士兵農工都看得慣，一方使士兵農工都買得起，然後報紙纔能夠深入社會的各階層，並在社會的各階層發生廣播抗戰觀念的作用，然後能夠達成全民族總動員的目的。

要怎樣編輯怎樣著述纔會成爲大衆化的報紙呢？那我們就要說，要用比現在更深入淺出的手腕來編輯新聞，著述評論，然後纔會成爲大衆化的報紙。

筆者非不知這是很費力的事，文化水準較高的都市上中層階級，也必然反對報紙的過於大衆化。然現在大衆既的確熱望新聞事業者能發行他們所認「我們的報紙」的報紙，而爲迅速傳播「這一次非抗戰到底」的觀念於廣大的羣衆心目中起見，也需要發行這種能深入社會各階層的報紙，則以站在最前線自命的新聞事業者，就應該不顧費力不費力，馬上去做，更不必爲顧慮都市中上層階級的不滿意，而欲前復止。

萬一新聞事業者，恐怕報紙大衆化以後，會失去自己之歷史的代表性，並失去固有的閱者，那也不妨採雙軌的制度，同時編輯兩種的報紙，在保守現狀的報紙以外，再發行一種文化水準比較

低下的人也能够閱覽的報紙，就把這報紙送到抗戰士兵生產工人鄉村農民及其他商店夥友學徒，家庭使用人的面前，作為傳播抗戰觀念的工具。

如果是採這種雙軌的辦法，那就不僅報紙編輯的大衆化一個問題可以解決，同時報紙賣價大衆化的問題也可以同時解決，因為如果發行大衆化的報紙，就必然以小型報為主，小型報需紙無多，本錢廉省，批賣的價格自然可以降低，使其能够適合士兵農工大衆的購買力。

這種小型報，在北平就有好幾種，其中取得代表性的，是實事白話報，這報是士兵、工人、商店夥友、家庭使用人、各種車夫、小學生、俳優、歌女的報，但同時也不見遺於文化水準較高的人們。但在上海卻可說還沒有一種。上海的小型報，像立報、辛報、時代日報等等，都不是以供給下層社會爲主的報，其流行的範圍，多半限於社會的中上層，不能深入下層最廣大的羣衆。其所以不能，原因有兩種：（一）是內容和大型報幾無二致，報型雖小，並不具備大衆化的條件。（二）是太偏於文藝的性質，成爲有閒階級的消遣品雖有餘，而欲成爲下層勞苦大衆的讀物則有所不足。雖然，這幾種中的立報，如果能够把評論新聞的著編方法加以改革，使他更適合勞苦大衆的文化水準，那就頗有成

爲大衆化報紙的希望。因爲大衆所需要的報紙，議論愈少愈好，新聞愈短愈好，文藝作品愈駁雜愈好，報型愈小愈好，現在立報的報型，新聞和文藝作品，都很合這條條件，只要再少發一點非普通人所能了解的議論，紀錄新聞再更國語化大衆化一點，便有成爲一種大衆化報紙的可能。此外，南京的朝報，也不够大衆化的標準，因爲他那種專門爲有閒階級搜羅消閒資料的做法，和那樣多的篇幅，都不合大衆化的條件。

今姑不論上述的幾種報紙，都還缺少大衆化的條件，有力的新聞事業者應該爲着廣大的農工士兵羣衆，去發行一種真正大衆化的報紙，縱令上述的幾種報紙，都已成爲大衆化的報紙，有力的新聞事業者也應該再發行一種大衆化的報紙，來補充數量的不足。因爲農工士兵這一階層，是最廣大的一層，是抗戰的主力，在這戰時，實有藉報紙傳播抗戰觀念於他們心目中的必要。

此外，還有一種大衆化的報紙，就是本月中旬送到前線給士兵閱覽的陣中日報和陣中畫報，和上海路旁牆上所貼各種壁報和畫報，但這種大衆化的報紙，雖也很受大衆的歡迎，然而內容既過於簡單，新聞又多半都已變成舊聞，畢竟不能滿足大衆的慾望，我們也不能說他是真正大衆化

的報紙。

要而言之：我們中國的勞苦大眾是早就需要報紙的，其所以直到而今還看不到他們所認為「我們的報紙」的大眾化的報紙，當然是新聞事業者不會顧到大眾需要的緣故。然大眾既沒有他們自己的報紙，則其思想之不得不落後，其觀念之不得不薄弱，其文化水準之不得不低下，就都是必然的結果。這種大眾思想落後，觀念薄弱，文化水準低下的弊害，在平時還不算很大，而在這全面抗戰的期間，就到處都會受到他的惡影響。一則大眾思想落後，觀念薄弱，其行動很難適應現代戰爭的需要，二則大眾的文化水準低下，當然缺乏後方服務的智識和技能，其所予前方忠勇將士的助力也不會強大，三則白紙似的大眾的頭腦，不容易辨別是非，有中敵人宣傳毒的可能。現在我們不想彌補這弱點便罷，如果想彌補這弱點，那就必須提高大眾的文化水準，而提高大眾文化水準最捷的一徑，卻是發行大眾化的報紙，因為書籍是死的紀錄簿，報紙是活的教科書，而大眾求知時局消息的慾望也比大眾求入學校的慾望更強，有了大眾化的報紙他們便會自動地去解決如何閱讀的問題，只要他們能解決這一問題，那他們的文化水準就自然會漸次提高了。



此外，關於這發行大衆化報紙的問題，筆者除希望有力的新聞事業者趕快設計促其實現以外，並希望領導文化運動的高級機關，或社會機關，也急起直追，發行這種大衆化的報紙。我們要知道：我們中國自有正式的報紙以來，雖已將近七十年，但我們的農工大衆，卻還不會沐着報紙的恩惠，這不僅足以表示我們的新聞事業者的不會努力，也不僅足以說明我們中國都市和鄉村已成天堂和地獄的對比，實足以說明我們這幾十年來所有文化教育的活動，全是以都市中上層階級利益爲前提的活動，農工大衆則不會沾及文化教育的餘澤。我們直到而今纔感到農工大衆文化水準的過低，實抗戰前途的大障礙，雖有覺悟稍晚之嫌，但如果自今爲始，能趕快教育農工大衆去收亡羊補牢的後效，那就縱是稍晚也未嘗不能稍稍補救我們的弱點。此外，我們還要注意，我們這次的抗戰期，必然是很長的，在此時教育農工大衆，提高他們文化的水準，好比是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只要我們肯努力，也決不會發生「爲時已晚」的問題。所以，我們現在倘能够發行大衆化的報紙，利用血淋淋的抗戰活歷史來教育他們，使他們逐漸發生明瞭的民族意識，堅決的抗戰意志，也還來得及。

## 五 結論

著新聞學綱要的徐寶璜曾說：『在教育普及之國，其國民無分男女老少，平時有不看書者，幾無不看新聞者，言論行動，多受其影響。……其勢力駕乎學校教員、教堂牧師之上，實為社會教育最有力之機關。』然而我們中國的新聞紙，卻不能利用他的勢力來教育民衆，新聞事業在中國雖也已有七十年的歷史，但在這七十年間，能得到新聞事業的利益者，不過是新聞事業者的本身和大都會的中上層階級而已。日本的來菊詩屋說：『中國眼前的新聞紙，其狀況尙不及五十年前的日本新聞紙；』雖有形容過當之嫌，但中國新聞事業者的不會為農工大衆服務，不會脫卻以供奉中上階級為能事的腐習，卻是鐵一般的事實。著上海報紙改革論的郭箴一，曾憤憤然說道：『中國之資本，是屬於「奴隸化」之資本，故中國資本家之意義，即是帝國主義奴隸之意義。而號為全國報紙之上海報紙，則為其意識之表現。因此，故上海報館之經理董事，在大體上，不是銀行資本家，便是買辦資本家，而此等資本家，皆賴帝國主義乃有其存在者。我國上海報界之凋敝，不言可喻矣。』這

難道真是上海新聞事業直到而今還不曾盡其社教機關的責任的原因麼？倘事實並不如此，那筆者就敢請上海的新聞事業者，從今而後，不要專在供奉都市中上層階級上做工夫，並且要拿出全力去做教育農工大衆的工夫，去盡社教機關應盡的責任。

還有一點：我們中國若干報館的主筆先生們，很喜歡修正別人的主張，也很喜歡說趨時的話。這是中了封建主義和個人主義毒的結果，也是中國言論界對於「統一救國」以及「信任政府、擁護領袖」等運動不甚熱心贊助的原因。以能够標新立異爲光榮，以附和別人的主張爲卑怯，縱在不應該標新立異的時機，也偏要標新立異藉以表示自己言論的不同凡響。因此，他們對於任何政治問題、外交問題，都不願意無條件贊成政府當局措施，縱令政府當局的措施，絕對適合此時此地的需要，他們也一定要用吹毛求疵的意識，來做乘瑕蹈隙的文章。加以，在他背後的新聞事業者，又個個都自命不凡，都善於迎合「民怨其上」的心理，以求取得一種領導的地位，不僅不以其所謂主筆的善於吹毛求疵爲非，甚且要加以獎勵，加強其好立異的傾向，這一來，他們所製造的輿論，就不能不是反抗政府促成分裂的輿論了。現在我們希望這些新聞事業者和主筆先生們，都能

够了解今昔時代的不同，快些趕上時代，拿出「一致對外」的精神，加入信任政府、擁護領袖、奮鬥到底、抗戰到底的陣線，不要落在時代後面，用封建主義的意識，在有意無意中間，把使人懷疑中國上下不甚一致的弱點暴露出來，授敵人以可乘的罅隙。

最後，筆者敢請新聞事業者和新聞記者恕筆者的唐突。筆者所以很率直地指出一般新聞事業者和新聞記者的錯誤，並要求新聞界站到抗戰的最前線，是爲着抗戰的前途着想。大家必須明白：我們的敵人本是強國，然而他們爲着單純的陸海空軍不足以支持長期的侵略戰，正在加緊進行國民精神總動員的計劃，擬用一致對外的國民精神，來彌補海陸空軍力所未逮的地方，這就可見近代的戰爭，決不是單純海陸空軍的戰爭，而是國民的戰爭，戰爭的勝負，亦將以全體國民精神的能否一致爲斷。我們武力的不如人，既無可爲諱，倘欲爭取最後的勝利，就更非整個民族都有不辭一切犧牲的精神不可，整個民族既都必須拿出不辭一切犧牲的精神，從事抗戰，那本應站在最前線的新聞事業者和新聞記者，就更該犧牲小我的一切成見，不顧小我的一切利害，趕快造成抗戰高於一切的輿論，造成上下一致抗戰到底的意志，并在可能的範圍內發行大衆化的報紙，使其

深入社會的底層去傳播抗戰到底的觀念，

記得黃天鵬所著的新聞專業概論裏面，曾提到新聞紙的權威和功用，說新聞紙是「社會的耳目，國民的喉舌，人羣的明鏡，文壇的霸王，未來的燈光，現在的食糧。」筆者以為縱令再加上「社會教育的利器，精神國防的基石，保衛民族的先鋒，抵抗侵略的前衛」等等，也並不過當。雖中國目前的新聞紙，還不配受這種的恭維，但隨着時代的轉移，卻也必然會有日就月將的進步，請閱者姑拭目以待其進步罷！